

社科文献论丛第4辑/吴成主编

诗经论丛

殷光熹◎ 著

SHIJINGLUNCONG

线装书局

社科文献论丛第4辑/吴成主编

诗 经 论 丛

殷光熹 著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经论丛 / 殷光熹著. —北京:线装书局,2008.7

(社科文献论丛第4辑/吴成主编)

ISBN 978-7-80106-776-0

I. 诗… II. 殷… III. 诗经—文学研究—文集 IV.
I207.2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9420 号

诗经论丛

著 者: 殷光熹

责任编辑: 崔建伟 孙嘉镇

排版设计: 秋 水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定 价: 220.00 元 (全 10 册)

目 录

上 编

《诗经》与孔子诗教	(3)
-----------------	-----

宋代疑古惑经思潮与《诗经》研究

——兼论朱熹对《诗经》学的贡献	(10)
-----------------------	------

《秦风》总论	(20)
--------------	------

《诗经》征战诗中的生命价值观	(51)
----------------------	------

《诗经》中的田猎诗	(81)
-----------------	------

振兴民族文化,再建《诗》学丰碑

——第六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06)
------------------------	-------

《诗经》中的女子思乡归宁诗	(113)
---------------------	-------

“经营四方”,“岂不怀归”

——《诗经》中使臣自伤久役未归诗析评	(120)
--------------------------	-------

《诗经》中流亡者思乡盼归诗析评	(130)
-----------------------	-------

论《诗经》中的军人思乡盼归诗	(137)
----------------------	-------

关于《小雅·出车》诗中的人称归属和季节描写问题	(153)
-------------------------------	-------

下 编

周南·汉广	(161)
-------------	-------

召南·江有汜	(164)
--------------	-------

召南·草虫	(167)
召南·采芣	(170)
召南·甘棠	(173)
召南·行露	(176)
召南·羔羊	(179)
邶风·日月	(182)
邶风·击鼓	(185)
邶风·凯风	(187)
邶风·匏有苦叶	(189)
邶风·谷风	(191)
邶风·式微	(194)
邶风·简兮	(195)
邶风·北门	(197)
邶风·新台	(199)
鄘风·柏舟	(201)
鄘风·墙有茨	(203)
鄘风·相鼠	(205)
鄘风·载驰	(207)
王风·黍离	(210)
郑风·出其东门	(213)
郑风·褰裳	(215)
唐风·绸缪	(217)
唐风·有杕之杜	(220)
齐风·卢令	(223)

秦风·无衣	(225)
秦风·小戎	(227)
秦风·蒹葭	(232)
秦风·黄鸟	(238)
小雅·湛露	(246)
小雅·彤弓	(249)
小雅·菁菁者莪	(252)
小雅·六月	(255)
小雅·采薇	(261)
后 记	(265)

上 编

《诗经》与孔子诗教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按风、雅、颂分类，收入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这段时间的作品，共有 305 篇。孔子称其为“诗”或“诗三百”，并将它列为门弟子的必读书之一。

《论语》中记录了一些孔子有关《诗》的言论，过去曾有人将这些“诗论”说成是既“奠定”了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础”，又“指导”了后世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我以为，这种用今天的文艺理论框架去硬套的方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势必使原貌走样，不能得出科学的评价和结论。为了认清或恢复事物的本来面貌，有必要先对孔子有关《诗》的言论作一番梳理和分析，廓清其研究中的某些迷雾，然后才谈得上研究其他一些问题。

孔子在《论语》中有关《诗经》的言论，多属“诗教”范畴，并不侧重于对作品本义的解说，也不注重于对《诗经》本身的文艺性探讨，而往往是借诗明志、借题发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因而不能与严格意义上的“文艺理论”等量齐观。

孔子的“诗教”，有其自身的特点、意义和要求，它与通常所说的“诗歌理论”或“文艺批评”之类含意，基本上不是一回事。本文拟对孔子言《诗》的本义作一些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诗经》成为孔门弟子道德修养的教科书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①“思无

邪”句，最先见于《诗经·鲁颂·马同》篇，诗共四章，章意大致相同。其中第四章有：“思无邪，思马斯徂。”前三章句型相同，作“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陈奂在《诗毛氏传疏》中说：“思，词也。斯，犹其也。无疆、无期，颂祷之词。无斁、无邪，又有劝戒之义焉。思，皆为语助。”据说，这是一首颂扬鲁僖公养马之盛的诗。

何谓“思无邪”？何晏认为就是“归于正”的意思。^②所谓“正”，指孔子倡导的道德准则，所谓“邪”则指违背儒家道德准则的东西。

然而，如果拿《诗经》所反映的实际内容来与孔子倡导的道德准则相对照，并非都是“思无邪”而又“归于正”的作品。《国风》里的许多作品，诸如《硕鼠》、《伐檀》、《新台》、《墙有茨》、《柏舟》、《东山》、《将仲子》等，原本就不大符合“思无邪”的要求。孔子并非没有看到这种情况，例如他曾鲜明地表示，“恶郑声之乱雅乐也”^③，主张“放郑声，远佞人”，认为“郑声淫，佞人殆”。^④孔子既然知道《诗经》并非全都是“思无邪”的诗，为什么还要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呢？对于此中奥妙，朱熹颇能心领神会，他在《诗集传·序》里论“诗之所以为教”时，对孔子所说的“思无邪”作了系统地阐释，以期能自圆其说。他说：

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

朱熹虽然处处都在“代圣人立言”，但无意中却道破了孔子为什么要把《诗经》说成是一部“思无邪”作品的用心。他在《读吕氏诗记·桑中篇》中，相当“圆满”地对“思无邪”作了阐释，他说：

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惕惩创之资。

又说：

曲为训说而求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得之于我之易也。巧为辩驳而归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责之于我之切也。

作品的本来面目是一回事，读者如何读诗、用诗又是一回事。《关雎》明明是一首爱情诗，孔子对它的评价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⑤，也当属“思无邪”的作品了。至于后儒注《诗》，为了强调道德教化作用，不惜曲解诗意，乱加比附，如说此诗表明了“后妃之德”，就是典型例子。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能说与孔子的“思无邪”诗教无关。

孔子论《诗》，内容涉及多方面，其中关于“思无邪”之说，是以正邪善恶为标准，重在道德观教育。他强调“学《诗》”，但不注重对作品本义的理解和推求，而重在道德修养方面的主观感受。正如朱熹所阐释的那样，有些诗篇的作者，即便是“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将“邪”视为反面之物，从而引起读者的警觉意识，加以防范，不受“邪”的影响，由于朱熹深刻地把握了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⑥，故在阐释“《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方面，能够“代圣人立言”。

二、《诗经》成为孔门弟子从事社交活动和获取功名利禄的必读书

春秋时期，各国君臣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常常“赋诗言志”，或者通过“赋诗”来“观人”、“知志”、“知行”，以致形成一种风气。正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公赋《六月》”《正义》所说：“古者礼会，因古诗以见意，故言‘赋诗断章’也。”《汉书·艺文志》（三十）也有这样的记载：“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在这种场

合,各国君臣往往引诗为证,如《左传》引诗见于今本《诗经》者近半数,《国语》引诗,见于今本《诗经》者占大多数。这些引诗、赋诗,大都是断章取义,置作品的本义而不顾,难怪当时齐人卢蒲癸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⑦这充分说明,《诗经》在当时的社会活动中被人们当作“为我所用”的工具,“人无定诗,诗无定指”^⑧,可谓一语中的。

孔子说:“学也,禄在其中矣。”^⑨子夏说:“学而优则仕。”^⑩为了使孔门弟子能够求仕干禄,孔子进行诗教时,必须考虑如何适应当时社交活动中“赋诗言志”的风气。因此,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⑪学《诗》是为了“达政”、“使于四方”,在各种场合还要能够“专对”自如,方算合格。为此,孔子从当时官场盛行赋诗言志的风气中归纳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⑫,作为人们交流思想和调整关系的指南。孔子在这里提出的“兴、观、群、怨”,主要不是从诗歌艺术本身的规律、特质和功能等方面着眼,而多半是利用《诗》的角度来谈这四种作用的。

孔子培养学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从政做官,因而一部《论语》有关“问政”、“为政”、“为邦”、“从政”言论,比比皆是。孔子的诗教,与此亦有关联。

孔子认为,学《诗》的主要目的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⑬。用读《诗》来培养学生“事父”、“事君”的忠孝思想,是孔子诗教的核心,孔子不止一次地说过:“吾道一以贯之。”^⑭“予一以贯之。”^⑮正是夫子自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形成了自身的思想体系,例如他主张“正名”,在音乐方面相应提出了“正乐”,崇尚雅乐,反对新声,他鼓吹“中庸”之为“至德”,故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类的诗论。为了“宗族称孝,乡党称弟”^⑯,于是提出读《诗》是为了“事父”的主张;为了“臣事君以忠”^⑰,于是在诗教上提出“事君”的观点,因为“学也,禄在其中”,所以他主张学《诗》是为了

“达政”、“使于四方”，能够“专对”。这都说明孔子的诗教，与他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吾道一以贯之”的话，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其根据和道理的。

三、学《诗》有助于孔门弟子增长知识、发挥才能

孔子说过，学《诗》的好处，除了可以“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外，还可以增强语言的表达能力，所以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这是从语言的角度强调学《诗》的重要性。学《诗》还可以开阔视野，如孔子曾告诫伯鱼，“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⑩孔子特别重视读《诗》后的启发作用，试举《论语》中二例，其一：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⑪

子夏所引诗，见今本《诗经》中《卫风·硕人》篇（第三句可能是逸诗）。诗里描写齐女庄姜的静态美和动态美，根本没有什么“礼后”的意思，而孔子却说：“卜商呀，你启发了我啊！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了。”子夏置诗的本义而不顾，却从诗中得到这样的启示：礼乐在仁义之后。孔子认为子夏读《诗》能够另有所悟，因而大加赞赏。再看第二个例子：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⑫

子贡所引诗，见今本《诗经》中《卫风·淇奥》篇，诗的第一章是这样写的：“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此诗是描写一个

青年男子整饬美观,才貌出众,并没有研究学问的意思,子贡却断章取义,以此来说明研究学问应当相互切磋、精益求精,博得孔子的赞赏:“赐呀(这才是真正懂得诗啊),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了,告诉你一件事,你能推知另一件事了。”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孔子在门生如何学《诗》的问题上,有自己的一套要求,即在断章取义的基础上得到某种启迪,至于诗本身的意义是什么并不重要。正如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指出的那样:“语自圣人,心眼迥别,断章取义,以该全诗,千古遂不可磨灭,然与此诗之旨则无涉也。”这种断章取义、赋诗明志的做法,既然为孔子所提倡,必然为弟子们效仿。所不同者:有些人是以学生身份向老师汇报读诗体会,如子贡、子夏;有些则是以老师的身份给弟子做出示范,如曾子的一席话:“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²⁹

学《诗》怎样为我所用?这是孔子诗教方法中的重要一环,他平时不仅对学生作引导、启发,有时还亲自示范:“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³⁰引诗见今本《诗经·周颂·雍》。孔子认为仲孙、叔孙、季孙三家滥用天子之礼,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僭越”行为,故引诗作证。根据这两句诗所说,天子是主祭,诸侯只是助祭,以此证明在三家之堂用天子之礼是很不合适的。这就是孔子对“兴于诗,立于礼”³¹的具体运用,“礼”仍然是其核心。

孔子认为,学《诗》还有个附带好处就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³²。《诗经》中涉及的知识相当广泛,除“鸟兽草木”之外,诸如典章制度、人物事件、民情风俗等,在当时环境下不失为“小百科全书”。历代研究《诗经》的学者,曾经做过大量的整理、注疏等工作。别的姑且勿论,仅《诗经》所写到的“草木”就有一百三十二种³³。

以上说明,孔子关于《诗经》的言论,基本上不是论诗歌创作本身的艺术规律、艺术特征及其作用、价值的,而是指导门人如何学《诗》、如何按主观需要去用《诗》、引《诗》。以致出现赋诗断章、借诗明志、各取所需的做法。由此可见,孔门诗教具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即通过《诗》来进行道德教化,为弟子们将来“达政”、“使于四方”打下思想基础,与此同时,为适应当时官场的“专对”风气,孔子要求弟子熟悉“《诗》三百”篇,学会用《诗》、引《诗》的本领,归根到底,是为了达到“事父”、“事君”的目的。

①《论语·为政》。

②《论语集解》引包成语。

③⑫⑬⑲⑳《论语·阳货》。

④⑨⑮《论语·卫灵公》。

⑤⑰⑳㉓《论语·八佾》。

⑥⑭《论语·里仁》。

⑦《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⑧劳孝舆:《春秋诗话》卷一。

⑩《论语·子张》。

⑪⑯《论语·子路》。

⑬《论语·季氏》。

㉑《论语·学而》。

㉒㉔《论语·泰伯》。

㉖见陈文郁《诗草木今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出版。

(原载《中州学刊》1994年第1期)

宋代疑古惑经思潮

与《诗经》研究

——兼论朱熹对《诗经》学的贡献

中国经学可分为三大学派：“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这三大学派几经兴衰，各有特点，各有得失。^①汉唐以来，“汉学”渐渐失去活力。至宋初，佛、老思想显得空前活跃，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乃至使石介惊呼道：“举中国而从佛、老。”^②以孙复、胡瑗、石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为了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打着复古旗号，标榜王权，鼓吹道统，反对佛、道，复兴儒学；同时也从理论上批评了当时的浮靡文风，提出文章必须“述国家之安危”、“正一时之所失”、“写下民之愤叹”。^③这与唐以前依据古注治经的做法显然不同。他们的言行或呼吁，打破了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沉闷空气，成为宋代新儒学和诗文革新的先驱者。

一

从前人的一些记载和论述可以看出，“庆历以前，多尊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甫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荆公修《经义》盖本于原甫。”^④刘敞撰《七经小传》，多出己意，与汉儒旧说不

同；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则以行政手段颁于学官，“视汉儒之学若土梗”。^⑤对以“五经”为代表的汉学体系进行大胆的怀疑，大有另起炉灶之势。

苏轼的《书传》，“以《胤征》为羿篡位时事，《康王之诰》为失礼，与诸儒说不同”。^⑥朱熹则说：“某疑孔安国书是假，《书》序是魏晋间人作。《书》易读者皆古文，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偏记其所难而易者全不能记。”^⑦

程颐的《伊川易传》，专明义理。欧阳修撰《易童子问》，辨《系辞》、《文言》、《说卦》以下皆非孔子之言，指责其是非不辨，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本非圣人之言，“其遂以为圣人之作，则又大谬矣。”^⑧

对“三传”的怀疑，最引人注意的是王安石。他在《答韩求仁书》中云：“至于《春秋》，‘三传’既不足信，故于诸经尤为难知。”^⑨关于《春秋》还涉及王安石的一桩公案：宋周麟之跋孙觉《春秋经解》说王安石“自知不复能出其右（指孙觉《春秋经解》一书），遂诋圣经而废之，曰：‘此断烂朝报也。’”尹知靖则认为：“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难也；废《春秋》，非其意。”^⑩林希逸则彻底为王安石平冤：“废《春秋》以为断烂朝报，皆后来无忌惮者托介甫之言也。”^⑪即便王安石不欲废《春秋》，但他确实说过：“三传，既不足信”的话，至少会给别人留下疑虑或采取审慎态度，如朱熹就曾曾说：“《春秋》义例，时亦窥其一、二大者，而终不能自信于心，故未敢措一辞。”^⑫

对于《周礼》，欧阳修指出：“《周礼》，其出最后。……汉武以为湊乱不验之书，何休亦云六国阴谋之说，何也？然今考之，实有可疑者。”接着在文中对可疑处一一进行考辨^⑬。苏轼认为：“《周礼》之言田赋夫家车徒之数、圣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国之大小，非圣王之制也，战国所增之文也。”并作层层辨析求证。^⑭苏轼更不客气，他说：“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详于《周礼》；然以吾